廣電時評：代孕弃養者，德不優法不容

我们注意到，近日有关演员郑爽境外代孕、曾欲弃养的消息引发舆论强烈反响。在很短的时间内，微博话题#中央政法委评郑爽代孕弃养# #我国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等登上热搜榜。

代孕不是私事，与法不合，有违社会主义公德。我国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行为，代孕、弃养更是违背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规避法律，境外代孕，又意欲弃养，这样的演员，私德有亏。演艺人员私德有亏，无论作品如何，其本人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上的社会公德示范作用不会积极正面。

从事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的演艺人员尤其是知名艺人，作为公众人物，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和示范作用，应当自觉践行行业自律准则，严格律己修身，严私德，讲大德，守公德。

行业主管部门的相关政策要求是明确的，严格的。广大人民群众不愿意、不接受、也不允许丑闻劣迹者污染我们的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

我们不会为丑闻劣迹者提供发声露脸的机会和平台，一如既往，坚决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健康向上荧屏声频。

侠客岛：代孕不合法！这事没商量

最近，艺人郑爽在国外“代孕弃养”的消息引发不少网友热议。不久前，知名导演陈凯歌在一档节目中制作的短片也涉及代孕话题，被中央政法委“长安剑”点名批评“越界”。

很多人认为，代孕事实上是将生育“商品化”、将女性物化，除了身体和心理损伤外，还会带来法律与社会伦理方面的风险。

有媒体做过统计，需要代孕的客户主要集中在不孕不育、失独家庭、同性人群、职场女性、高净值人群等既想要孩子又没能力自主生育的人群，尤其是不孕不育者。中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近些年，中国育龄人群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至12.5%-15%，接近发达国家比率，并呈年轻化趋势。

《中国新闻周刊》刊发的调查文章称，国内某代孕公司多年来已经“生产”了上万名婴儿，其创始人估计，全国从业者有“3万多人，鱼龙混杂”。按照该公司最低65万元一单、单笔30%的利润算，保守估计该公司利润以10亿计。谈及此，公司负责人竟称“不要只是谈钱，我们是做爱心事业”。

但钱显然是中介从事这行的主要动力。

2019年7月，《法制日报》做过一篇名为《代孕黑色产业链调查》的稿件。其中提到，目前全国的代孕中介已达400多家，大多属于“地下交易”，收费非常混乱。一般情况下，挑选卵子价格为6万元至10万元左右；代孕价格则按照不同档次定价，有不包成功的、包成功的、包生儿子等，价格也从40万元至135万元不等。

文章提到，真正“出租”子宫的代孕妈妈所得并不高，基本在10万-20万元，中介的单笔利润大概在30%-60%之间。一些中介机构还推出各种“套餐”，明码标价；一些机构为招揽用户，还专门声称“女大学生供卵”“外貌好”“名牌大学”“身高1.70米”等。

利润驱动产业。在印度，代孕平均成本2.5万美元，有机构估计代孕产业每年为印度创收23亿美元；在美国，代孕成本为7万美元；在乌克兰，有当地媒体估计，每年大约有3000名代孕婴儿在乌出生，平均成本3万美元，甚至有人将其称为“欧洲子宫”。

除代孕者外，还有明码标价的“捐卵黑市”。中国裁判文书网2019年6月登载的一份二审行政判决书披露，安徽马鞍山市一家民办机构非法从事采集精卵子与胚胎移植等活动，短短1年多时间内开展取卵手术293例，非法获利高达639万元。

代孕也是高风险产业。

尽管网上的广告说保证安全、健康、无痛、无风险，但事实上，供卵者也好，代孕者也好，都会面临不小的健康风险。

以取卵为例，据报道，大部分地下代孕往往寻找黑诊所取卵。由于缺乏监督，存在消毒不彻底、器械重复使用、操作不规范等问题。如果将卵子从卵泡中取出，需要刺破卵巢，会在卵巢上留下创口；若室内细菌超标，轻则发生生殖道感染，引起盆腔炎，影响今后生育；重则感染乙肝、梅毒、艾滋病等传染病，甚至当场就可能因感染危及生命。

同样，那些“包生男”“包生女”“包龙凤胎”的宣传，背后也有无数隐忧。有的客户反悔，代孕者就得强制人流；为了安心“养胎”，代孕妈妈往往被集中安置、有专人“监护”；也有的产妇历经十月怀胎和痛苦生产，却因无法看到孩子，产生严重的心理疾病。今年以来，国内已有多起因争夺代孕所产婴儿引发的法律纠纷案件。

同时，代孕也会存在很大的道德风险。像郑爽这样代孕后弃养，孩子到底怎样安置？代孕本质上是商业交易，但作为“产品”的孩子又不是纯粹的商品，怎能7天无理由退货？被弃养的孩子如果一出生就被送进福利院，对无辜的孩子来说极不公平，也是极不负责任的。父母和孩子之间缺乏十月怀胎的情感培养，说弃就弃，本身就是很不道德的行为。

2016年，曾经的“代孕天堂”柬埔寨发布针对商业代孕的禁令，该国内政部官员称，国家再穷也不能靠代孕减少贫困，拒绝充当“出售婴儿的工厂”。

在中国，代孕被明令禁止。

原卫生部2001年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3条第2款明确指出：“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不过，上述规定是部门行政规章，主要约束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法律层级不高，规制力度有限，刑罚缺乏上位法依据。现在的新情况是，如果是个人或者中介机构从事代孕业务，又当如何处理？

事实上，目前不仅许多有代孕需求的人远赴海外代孕，国内也有代孕机构从事此类业务，在灰色空间中构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原《法制日报》曾刊发长篇调查报道称，很多代孕机构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将洽谈地点、代孕妈妈住所、手术室分开，且往往借助正规的医疗机构开展违规服务。

由于代孕与中国传统社会伦理、道德及公序良俗相违背，在司法实践中，代孕妈妈和委托父母之间签署的合同、代孕机构和代孕客户之间签订的合同，均会被认定为无效合同。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已有数百起因代孕引发法律纠纷的案例。

支付宝等不再售卖互联网存款产品专家：中小银行或将受到较大冲击

伴随着互联网贷款、互联网巨头垄断、互联网理财等方面加强监管之后，互联网存款业务也日渐提上监管日程。

1月15日，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规范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个人存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指出，商业银行不得通过非自营网络平台开展定期存款和定活两便存款业务。对此，金融科技专家苏筱芮向红星资本局分析认为，这意味着，包括支付宝、腾讯理财通、度小满金融等9大头部互联网平台不得再售卖互联网存款产品。“在此背景之下，中小银行或将受到较大冲击，其负债端将面临挑战。”苏筱芮称。

高息揽储：

80多家银行网上吸存，部分存款规模翻番

苏筱芮告诉红星资本局，互联网存款是银行在互联网平台上推出的产品，产品和服务由银行提供，平台提供存款产品的信息展示和购买接口。“这类产品收益高、门槛低，已成为部分中小银行吸收存款的重要手段。”

东吴证券做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18年资管新规启动后，银行理财的收益率走低，而且新的净值型产品“打破刚兑”，性价比明显降低。“在此背景下，保本保息、合法刚兑的存款有了新卖点，互联网存款业务快速兴起。”

2018年5月，京东数科（原京东金融）与富民银行合作，推出首个互联网产品“富民宝”；2018年8月，微众银行推出“智慧存款+”，投资者到期之前可随时提前支取，提前支取利率有的高达4.5%；2018年10月，腾讯对部分微信用户开放了工商银行的存款产品……根据开源证券不完全统计，互联网平台存款类产品，主要由城商行和民营银行提供、相关银行数量合计占比近9成；产品期限以3至5年居多，平均利率较同期限的定期存款高出1个百分点左右。报告指出，“高息揽储”与互联网平台流量等共同作用下，相关中小银行存款规模快速增长，部分城商行、民营银行2019年存款规模甚至翻番。

纷纷下架：

存在六大风险隐患，监管层密集发声

由于互联网存款规模快速增长，立即引来监管层的高度关注。

从2019年5月开始，监管部门就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对互联网存款产品进行严监管。特别是2020年以来，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还多次公开谈及互联网存款产品的风险，给其敲响了警钟。

红星资本局梳理发现，孙天琦重点谈到了互联网平台的资质问题和银行负债业务的流动性风险问题。其讲话中指出，部分地方银行存在通过缩短付息周期或发放加息券、现金奖励等方式变相提高存款利率、过度滥用“存款保险”标识等问题。另外，孙天琦还点出其存在两大风险苗头：第一、有的银行平台存款规模占其各项存款比重达83%；第二、几起疑似银行“挤兑”事件中，线上占比80%。

在去年12月15日第四届中国互联网金融论坛上，孙天琦更是强调：近两年多家银行在互联网金融平台推出了存款产品，互联网金融平台开展此类金融业务，属“无照驾驶”的非法金融活动，也应纳入金融监管范围。

在最近面对《财经》专访时，孙天琦还提出认为互联网存款产品存在六大风险隐患。具体为：第

一、互联网平台未经批准，违法违规开展代办储蓄业务；第二、违反存款计结息规定，扰乱利率市场秩序，推升银行资金成本；第三、滥用存款保险兜底机制，在存款市场恶意竞争，暗示“零风险、高收益”；第四、高息揽储必然追求高收益资产，匹配高风险项目，导致资产端风险增加，中小银行脆弱性提高；第五、增加了中小银行流动性隐患；第六、账户管理、资金出入等方面存在合规风险。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认为，从长远看，对互联网存款的过度依赖不利于银行发展，势必推高资金成本和资产端偏好高风险，不利于银行稳健经营。

在此背景下，从去年12月开始，包括支付宝、京东金融、度小满等多家互联网平台纷纷下架互联网存款，并表示，已停止新用户购买相关产品，相关产品只对已购买产品的用户可见。红星资本局今天分别登录上述部分互联网平台，暂未发现互联网存款产品。

冲击风波：

中小银行首当其中，部分银行已谋求他路

“伴随着监管加强和互联网平台主动下架银行存款产品，或使得相关存款规模增长有所放缓，部分产品提前赎回的压力可能上升，进而导致相关存款规模下降等。”开源证券分析指出，从中长期来看，规范互联网平台存款，有助于引导银行合理管理负债、防范流动性风险等，也有利于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

与此同时，苏筱芮向红星资本局分析称，此次受到冲击最大的群体或将是中小银行。“因为他们的资本补充渠道不及大行，对存款的依赖程度较高，尤其民营银行由于缺乏网点，更加依赖线上吸储，中小银行的负债端将面临挑战。”

据其透露，在此次监管风暴之下，包括蓝海银行、众邦银行等部分银行已经开始谋求他路。“我作为金融消费者，就已经陆续收到了蓝海银行、众邦银行的短信，短信内容重点推荐其APP、小程序。”这在苏筱芮看来，上述银行这么做无疑是可喜的进步。

苏筱芮建议，这些银行需要通过加强融资来缓解监管带来的冲击；同时更要做好客户精细化运营，发展自营渠道，通过手机银行、微信银行等新型方式提升自身的运营能力。另外，地方法人银行也应坚守本地地位，在自身的能力范围内精耕细作。